

有议价能力的“零工”，有什么不一样

北京通州马驹桥零工市场三个“日结工”的故事

□ 新华社记者 莫鑫

凌晨四点半，北京的天空还在夜幕笼罩之中，马驹桥商业街公交站旁的十字路口，已是人头攒动喧闹一片了。

一辆小面包车打着双闪停在路边，下来一位老板模样的中年男子吆喝：“亦庄库房物流分拣，一天150元管午饭，只要10个人！”

说话间，周围数十人一下子涌过来，狭小的车厢被瞬间挤满。中年男子不由分说，连拉带拽地挑够10个人后，用力关上后车门，一溜烟开走了。

陆陆续续，这些找到活计的零工，开启了在北京打工赚钱的一天。城里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此时大多仍在睡梦中。

上午八九点钟，除了少数零工仍不甘心地守在路边趴活外，没摸到活儿的人都已各自散去。此刻的十字路口已是车水马龙，沿街有近30家劳务中介公司也开门上班了。

相形之下，零工市场还有一些“另类”：他们大多挎着一个军绿色单肩包，里面有量尺、水平仪等工具。遇到来招工的也凑上前听听，感觉工钱低就侧过身给后面的人让路，时不时还刷几下手机里的消息。

一旦赶上来了活，他们或三言两语跟着雇主上车，或一通电话微信后匆匆离去……这些靠手艺吃饭的工匠，趴的多是四五百元的活儿，要求工钱日结。

在马驹桥常年抢活儿干的零工眼里，这些老师傅手艺好、身价高，几天没活儿都不在乎，算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大神”了。

日前，记者走进这个通州与亦庄交界处的零工聚落，与几位日结“大神”一起趴活儿。从他们的事迹中，感受到职业技能赋予这个群体的尊严与价值感。

欠薪欠怕了：千日结始于无奈，终于自在

今年61岁的张军是江苏连云港人，年轻时在大连干瓦工，后来跑到苏南一带干过几年。他辗转来到马驹桥，一待就是十几年——从早期的亦庄工业园区到后来的亦庄新城，大大小小的建筑工程没干过。

回忆早年被欠薪的窘境，张军至今仍感慨不已：“经常一年干到头，年底要钱跟孙子似的，受那气干啥？”“有些小包工头利润不高，手头也不宽裕，他自己都没拿到钱，拿啥给你结？”

在他看来，干这行难免被包工头押钱、欠账，克扣工资是常有的事。只有日清日结心里才踏实，还能保证每天八小时工作，不用加班。于他而言，这样一天一结账已成习惯，干不干由自己说了算。换言之，虽始于无奈，却终于自在。

“我在这儿连租房带吃饭，一天花销最少得五六十块，加上抽烟喝酒，每月生活费得2000多块钱，赶上一个大学生的花销了！”张军坦言自己多时月入过万，少时也能挣五千多。

常年在附近别墅区承揽维修工程的覃浩，一直在马驹桥雇零工，市场里熟人不少。这位地道的北京房山人提起工程结算难，同样一肚子苦水。像他这样的小工头，被拖欠工程款是常事，理由更是五花八门。



凌晨五点，北京通州马驹桥零工市场已人头攒动。

新华社记者 莫鑫 摄

2013年，覃浩承揽一项造价60万元的别墅改建工程，甲方预付了20%工程款。岂料项目完工时，对方因涉及非法集资被骗五六百万元，无力支付余款。这笔钱一欠将近10年，直到今年2月才结清。

为了填补这笔尾款的窟窿，覃浩这些年没少东拆西借，同期只敢承包一两项工程——生怕工程占款太多，资金链断掉，最终连工人工资都付不起。

目前零工市场上的水电工、瓦工、焊工等技术工种，日薪标准都在500元左右。建筑业离不开这些工匠，尤其是维修工程，手艺好的师傅很难找，待遇不好也留不住。覃浩长雇的3个工匠，包吃住每天给400元，工资虽然按月结算，但极少拖欠。跟他时间最长的一个师傅，已经干了11年。

即使跟覃浩这样靠谱的包工头干，张军始终都要求日结，且最多连续干个三五天。毕竟自己年龄大了，体力大不如前，更适合这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日结。

“我刚来北京时，油条5毛一根，现在涨到2块了。日结工资从一百涨到四五百也正常。”张军认为工资理应与物价上涨同步。

“现在瓦工主力都50岁以上，干不动的都回老家了。从事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张军说日结工资还得涨，不过再过5年自己可能也退休了。

我值这个价：工钱低于300元，宁可回去歇着

刚来马驹桥2个月的任强，虽接了个改水电的“大单”，仍觉得干日结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正纠结要不要出国打工。

3年前，他从山东济宁来到北京一家装修公司，每天干八九个小时水电改造，日薪400元。去年秋天，经熟人介绍通过劳务派遣方式，任强进入亦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从事设备用电的维修保养工作。

没想到进厂才十几天，他就遇到订单减少

工人放假，一放就是10天，假期不给工资。复工仅半个多月又放假了，不免让他闲得心慌。

几经考虑，任强决定重新在亦庄附近找个工厂直招、有五险一金的工作。算上押后的一个月工资，他从这家合资企业共结回9400余元工钱。

离职后，任强找工作屡屡碰壁，劳务中介公司的答案近乎统一——超过35岁，直招不要。即使有个别岗位年龄放宽到40岁，可他已经43岁了。

为了离马驹桥零工市场近些，任强从3公里外的周营村搬过来，目前合租一个月700元，是带独立卫浴的单间。与月租四五百元的“面壁屋”相比，他感觉奢侈不少，“水电工出门干活要自带设备，住得宽敞点也方便出入。”

在马驹桥零工市场，物流分拣、保安、仓库保洁、印刷厂临时工等岗位长期缺人，但最近日薪一直低于150元。

有时揽不着水电的活儿，任强也不敢歇着，价码太低的活儿，又实在瞧不上。他给自己定了个价，300元一天是底线，否则宁可回去歇着。

在这里趴活儿的日结工，都指望多认识几个包工头积累人脉。任强相信只要干活靠谱，后续会有回头客线上“下单”。

春节之后，他一共干了23天日结，收入有万把块，包工头的微信也加了不少——谁能给多少钱，谁手里活儿多，都摸得差不多了。他打算再观望一阵，找个靠谱的包工头长期干，也可能离开马驹桥。

“大女儿在私立高中读高二，一年学费一万多，小儿子才3岁，怎么着也得给他挣套房。”这两年任强每年收入10万元，家里就他一个人挣钱，压力不小。

任强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再闯个十年八年。过年回老家邻村几个工友说，去新西兰和非洲打工一年能挣20万元，他有点心动。

工友还告诉任强，一般出国劳务合同一签3年。他预计能攒下40万元，足够儿子在县城买房的首付了。

算完这笔账，任强就接了个包工头的电

话，朝阳区一家快餐店需要改水电，想3000元包给他，一周干完。

任强对这个价格比较满意，打算干完这单再想想出国的事。

老了不留村：在外打工，有孩子的地方就有家

前些年，在河北邢台老家开餐馆的季景忠，发现镇上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生意不好做。老季的二女儿在天津三星工厂打工，其余3个孩子都在北京工作——2个女儿在马驹桥找到了营生，成家后各生了2个孩子；儿子从廊坊理工学院毕业后，已在通州的一家药企入职。

4个孩子都不愿意回老家，老季也不想变成留守老人。2015年，他索性把餐馆关了，和老伴一起来到马驹桥，一边打着零工挣钱，一边就近帮衬孩子们。

今年57岁的季景忠，年轻时外出干过建筑活儿，练就一身瓦工手艺。

当年，他和妻子一起外出务工，常把大女儿带在身边。后来孩子多了，外出务工就少了。跟父亲学会了“清河八大碗”的手艺后，便在镇上开了一家餐馆。

在马驹桥，季景忠大多找瓦工活儿，老伴则主攻保洁、家政等零工。两口子要是同时有活儿，能日入六七百元，一个月的房租就不愁了。

“大女儿开餐馆和我们在路口趴活儿挣得也差不多。”老季有些得意。

他和老伴去年一共挣了13万元，除去日常开销，剩下的钱基本都补贴给了几个孩子。

“3个女儿都有孩子要养，儿子和女朋友谈了好几年，今年准备结婚，我们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对于季景忠来讲，“为了孩子”是干日结最大的动力。

“过年后这里人气旺了，外地工人比去年多了不少，但活儿好像没跟上来，工钱压得有些低。去年还有不少防疫活儿，今年这块儿没了。”季景忠接到的日结活儿，有时也会掉到350元左右。

疫情期间，有些工地用工量大，零工市场建筑工数量有限，工钱高。有的活儿能连续干上一个月，八小时一个工，季景忠能挣500元，活儿急时白加黑干两个工。他会休息一两天，歇过来再继续去。

去年，老季在北京做心脏支架手术，花了3万多元，医保报销一半多。出院后，他轮番去女儿和儿子家休养。能在子女身边，让他倍感欣慰。

“年轻时孩子跟着我们，老了 we 跟着孩子了，有孩子的地方就有家。”季景忠把家庭微信群改名为“京津冀一家亲”。

前几年，他在老家起了一座三层小楼，有七八间卧室，可一家人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对他来说，房子盖得再好没什么人住，不如在马驹桥离儿女近些。

季景忠看了看表，已是早晨八点，估摸着今天没活儿。他打算去农贸市场买点菜，回家给老伴准备晚饭，等着她干完一天保洁后回家。

（文内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记者 汪军 徐海涛 彭源）礼钱从动辄上千元减少到100元，酒席支出比过去减少1万元……“新华视点”记者近日在多地采访发现，部分农村地区“白事”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村民负担明显减轻。

人情负担明显减轻，不少村民摒弃大操大办观念

提倡三天之内安葬，最多不超过五天；单份礼钱不超100元；酒席每桌不超13个菜——初步测算，操办“白事”平均一场酒席可节省8000元至10000元开支。

在贵州省麻江县谷硐镇黄泥村，由党员、干部、乡贤等人员组成的“红白理事会”深受群众认可。理事会对婚丧嫁娶的礼金、桌数、菜品等进行严格限制。黄泥村村委会副主任张朝学介绍，经过近年来的实践，绝大多数村民摒弃了大操大办的观念。

近年来，我国大力倡导丧移风易俗，从办事申请、酒席成本、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方面，各地创新举措，推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绿色节约、以人为本的丧葬新礼俗日渐深入人心。

在湖南等地，丧事简办纳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自治清单，村规民约规范事项，每年由乡镇和街道对执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奖惩；在山东等地，基层组织对“红白理事会”骨干成员进行培训。

地处桂西的隆林各族自治县，“白事”是不少家庭非常看重的事情。依照风俗，部分逝者亲属参加“白事”要送牛到现场。有时一场仪式下来，“牛礼”高达十几头，不少群众因此背上一大笔债务，经济负担沉重。

“现在‘白事’仪式时间、回礼习俗都进行了大幅调整。”隆林县德峨镇党委书记罗仁华说，近年来，不少村屯把办理“红白事”的标准及奖惩规定纳入村规民约，试点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村民的人情债、攀比风明显少了，大家还积极赚取积分争当文明家庭。

“以前红白喜事办酒席，亲朋好友份子钱少则三五百元，多则上千元，赶上办事多的月份，人情负担十分沉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河东镇王大汉村党支部书记段春瑞说，从前的有家里老人过世，要连续几天办流水席。现在，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办酒席有了新约定。同样是“白事”，亲友们只集体上门吊唁一次，礼金控制在100元至200元。

减轻群众沉重负担靠什么？

记者在多地村庄走访发现，“红白理事会”等组织在减轻群众“白事”负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麻江县谷硐镇黄泥村为例，“红白理事会”负责制定酒席办理标准、场地等方面的规则，再由若干个管理委员会（每个委员会5名村民）负责实施，对酒席申请、办理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确保依规行事。

此外，黄泥村的“合约食堂”特色鲜明，餐具、桌椅一应俱全。村民如果摆宴席，需要事先向“红白理事会”提出申请，按照约定向“合约食堂”交200元卫生费。张朝学说，村民自行采购酒席食材，平均一场费用不超过2万元。

“家家户户都严格按照约定的规则办酒席，村民之间形成互相监督的机制，既约束了大操大办的炫富行为，也让经济困难的群众不再有压力。”谷硐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王廷祥说，这个做法已经在全镇铺开，成为一种乡村治理机制。

隆林各族自治县新州镇鹤城新区安置点是广西万人以上易地搬迁安置点之一，有安置群众3300多户、1.4万余人。记者走访看到，安置点建设了专门的“白事”馆。“白事”集中办理形成制度并张贴公示，时间、规模、场所等都有细致规定，还设有约束监督机制。“社区明确禁止大操大办，只限一事一地办理，期限原则3天以内，最长不超过5天。‘白事’还应在事情办理3天后向‘红白理事会’报备情况，并进行公示。”社区党委书记陈贵仲说。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安永军认为，无论是村规民约还是县乡政府出台的制度，一旦明确指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推出合理的约束性措施，加上科学引导，就能产生有益的变化。

去年，农业农村部等八部门联合发文，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农村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报备制度。

树立新风与尊重传统并举

随着移风易俗的推行，各地在“白事”办理上更加节俭。受访人士认为，移风易俗往往需要久久为功，要持之以恒地抓；同时，要考虑地方文化差异性，因地制宜，注意工作方法。

长期关注乡村治理的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丁胜说，对于农村“红白事”大操大办这个“老大难”问题，一方面要对现有的“滥办、乱办”现象进行抵制，另一方面关键是要让新观念、新风尚融入千家万户。在推行过程中要多方发力，坚持不懈，避免“一阵风”现象。

隆林各族自治县新州镇鹤城新区驻村第一书记谭思波说，移风易俗，要多注重用新风尚替代旧习俗。比如，以前群众办“白事”习惯请唢呐队演奏，费用比较高；现在改为播放哀乐，既尊重了群众意愿，又节省了开支。

做好群众工作，要让群众参与进来，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广西德保县城城镇云梯村党支部书记黄恒鲁说，除了发挥制度上墙作用，村里农闲时还组织擅长唱山歌的村民，用壮语和普通话在村里传唱，让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业内专家建议，各方要努力做好政策宣介、经验推广、舆论引导工作，帮助群众算好人情账、经济账、精力账，带动群众自觉抵制陈规陋习，健全移风易俗长效机制，以乡风文明赋能乡村振兴，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随礼减至百元，办酒席少花万元

部分农村地区『白事』负担减轻的背后

“体检”山河 防灾减灾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观察

热点观察

新华社福州4月5日电（记者 刘夏村 周义 姚子云）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将于今年全面收官。当前，普查工作成效如何？普查成果如何服务防灾减灾？带着这些问题，近日记者参加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媒体基层行”活动，赴福建、江西等地开展调研。

“把脉”“体检” 摸清风险底数

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193号，福州市应急指挥中心所在地。指挥中心墙壁上，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引人注目，上面显示的管理系统集纳了福州的应急、气象、住建、市政、公路、地质、水旱、海洋和林草等9个专题65个图层数据。

这张自然灾害普查成果“一张图”，犹如一项项体检指标，构建了当地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基础数据体系，为灾前、灾中、灾后的自然灾害综合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任立明介绍，通过普查数据的多源采集以及有效整合，建立统一的自然灾害普查数据底座，能够快速、及时、便捷地全面掌握自然灾害相关信息，为应急指挥调度提供决策支撑。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基础性工作。2020年5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近三年来，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地区坚持“全

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和“试点先行、适度扩面、全面铺开”的工作步骤，开展普查调查工作。

这次普查中，在福建，汇聚了9个行业约1307万条普查调查数据；在江西，获取全省灾害风险要素数据2000多万条……在全国，共获取灾害风险要素数据数十亿条，并取得多项“第一次”。

——第一次全面摸清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的“家底”，形成具有空间位置和物理属性的房屋建筑海量数据，特别是城乡房屋建筑第一次有了“数字身份证”；

——第一次摸清了全国森林可燃物载量的“家底”，为我国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提供重要基础；

——第一次开展并形成了覆盖“全国一省一市一县一乡镇一社区村一农户”的政府、社会、基层、家庭等全国综合减灾能力调查数据集；

……

“调查是灾害风险普查的基础。”国家减灾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郑国光表示，通过普查调查工作，基本摸清了全国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查明了重点地区抗灾能力。

对症“下药” 助力隐患治理

晋江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台风、风暴潮是最主要的海洋灾害。结合这次普查，晋

江全面摸清了区域内121公里海岸线海洋灾害基本情况，形成了晋江市第一部海洋灾害风险评估报告，并同步开展海岸带防护修复工作。

“我们根据普查数据，对红树林种植进行精确规划。”晋江市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与地质矿产科科长王玉志说：“红树林通过消浪、缓流、促淤三大功能实现防浪护岸效果，有重要的海岸带防灾减灾功能。我们历时1年零8个月，共种植修复红树林2912亩，海岸生态化改造6.2公里。”

福建省普查办副主任、省减灾中心主任周翔介绍，福建省将普查数据成果应用到防灾减灾工作中，直接利用灾害点位数数据开展隐患治理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

以普查数据助力基层隐患点整治，类似做法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例如，湖北基于普查成果数据，对库区2000余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一点一策”提出防治措施；重庆大力推进桥梁隧道、易涝区域等风险点物联智能感知配套建设……

国务院普查办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司副司长袁艺介绍，此次普查形成了我国主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分区划与防治区划，为进一步在单灾种风险防范基础上开展综合风险防范和灾害针对性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深化应用 强化事前预防

记者调研发现，不少地方正探索以普查